

● 政治学理论

邓小平“走向社会政治”思想论纲^{*}

刘 德 厚

(武汉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刘德厚(1934-), 男, 湖北汉川人, 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

[摘 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 是政治关系沿着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逐步走向社会化的政治, 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创新的过程。社会“政治关系的五大转化”, 是邓小平走向社会政治理论的基本内容, 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重大发展, 是指导中国社会政治健康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

[关键词] 走向社会政治; 阶级的阶层化; 政治关系社会化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99(2002)03-0261-12

—

邓小平理论是我们时代的旗帜。在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这个理论始终代表着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坚持他的学说, 学习他的著作, 研究他的思想, 发展他的理论, 是对这位历史伟人的最好纪念。邓小平理论中有着十分新颖、十分丰富的政治思想, 其中一个重要的贡献, 就是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的本质是从阶级政治走向社会政治。

使用“社会政治”一词概括社会主义未来政治的本质, 是我在1984年撰写的《对民主的历史唯物主义思考》^①一文中曾做过的一种表述。后来在研究经济政治学理论、广义政治理论和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学说体系时又多次使用过它。可以说, “社会政治”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广义政治观中引申出来的一个重要范畴。社会政治成为了探索人类社会政治进程的一个基本原理和重要概念。我曾专题发表《关于“社会政治”的一般理论》一文^②, 对社会政治的思想渊源、本质特征、方法论及其现实意义做过系统论述。社会政治早已被史前社会的历史所证实, 又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提升, 成为未来无阶级、无国家社会新型政治形态的科学假设。它是邓小平“走向社会政治”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是在活生生的社会主义政治生活实践中产生, 并在其发展中不断成熟起来的。尽管社会政治的最后实现是未来的事情, 但它又天然地同当代中国的现实政治发展直接相连。“万丈高楼从地起”, 把社会政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最高目标, 它的最终结果是在将来, 但它发育的起点和要素的累积则是从现实开始。社会政治的实现, 必然会始终寓于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创新过程之中。没有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 就没有社会政治的理论。同样, 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的正确指导, 也不可能对社会政治的自觉创造。邓小平关于走向社会政治理论, 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

^{*} 收稿日期: 2001-12-20

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应用与发展,把它作为全党、全国人民最为宝贵的思想财富,深入研究它,努力实践它,对于解决我国现实社会政治发展中的种种难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我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人们心中一直存在一个疑问,即中国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政治到底是什么?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这个重大问题没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真正搞清楚。一些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研究者,对之也长期停留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狭义政治观教条式的理解上。^③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这种理解被推向了极端,在实践中造成了对正常政治生活的极大破坏。直至今日,还有人政治“谈虎色变”,心存余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了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开始了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理论界则似乎又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已经过时”的思潮。于是,有的人主张引进“社会民主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政治观,来填补我国政治理论的“空白”。面对这个复杂的情形,邓小平在总结国际和国内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坚定不移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政治理论基础就是“走向社会政治”。

二

邓小平“走向社会政治”的理论,是在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政治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产生的。

作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老战士的邓小平,亲身经历了整个 20 世纪中国和世界历史变革过程。他紧紧抓住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这一根本点,把握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关系的本质特征,奠定了他的走向社会政治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基础。我们知道,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把彻底解放全人类作为自己的最高利益,把阶级的政治解放作为人类解放的首要政治前提,以推进经济的社会解放和人自身的解放。无产阶级从阶级性政治斗争,转向实现经济的社会解放的任务是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必然阶段。邓小平纯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分析 20 世纪整个世界历史变革最为直接影响他的政治观转变的社会实践,是四大历史经验教训:其一是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斯大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教训;其二是 50 年代中期中国反右斗争扩大化和“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其三是 1966—1977 年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其四是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的深刻历史教训。邓小平从阶级性政治观转为走向社会政治的新政治观,大体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 60 年代中期,是邓小平关于走向社会政治理论的萌发时期。他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人民政治的思想。要求全党充分认识共产党执政的新特点、新规律,正确处理领袖、政党、国家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大家都知道,这个时期,毛泽东一方面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伟大学说,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否定党的八大的正确决议,为形成后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政治错误埋下了思想祸根。邓小平虽然也受到了影响,但他仍然表现出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勇敢和创造精神。^④从现在已公开的文件看,邓小平在这个时期,结合当时苏共所揭发出来的严重历史教训和中国共产党所存在的实际问题,从政治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共产党执政要坚决反对党内的特殊化,防止特权阶层的形成;反对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警惕党和国家变质;张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一刻也不脱离人民的原则;提倡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加强人民监督。总之,他为: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就是人民政治。因此他在自己分管的工作中,力求结合实际,深入群众,把党的政治工作,彻底贯彻到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实际工作中去,一切为了人民的各项具体工作中去,面向实际,解决问题,强调党的政治工作的社会化。比如他强调: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后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变化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政治任务的根本出发点就是一切都要为人民服务^⑤;党和国家的主要政治任务就是搞建设^⑥;党要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扬社会主义民主^⑦;思想政治工作要贯穿于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去^⑧。所有这些重要论述,体现了邓小平在中国阶级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开始注重把党的政治工作的重心转向社会政治方面的思想萌芽。然而,在当时国内外形势下,这些思想不但没有受到毛泽

东和全党的重视,反而因之受到来自左倾错误的干扰。

第二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发展到全面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时期。当时,强调用阶级观点分析一切,看待一切;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把所有社会关系都一概看成为阶级关系,所有的社会矛盾归结为阶级矛盾,所有政治问题,都划归为敌我问题。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发生极为严重的危机。邓小平虽然暂时被迫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陷入逆境,但他目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混乱,仍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度,沉着应对,冷静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自然也包括政治理论方面的根本问题。1974年,在毛泽东提议下,邓小平复出工作。他首先提出了“全面整顿”的方针,从处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入手,批判当时普遍流行的所谓“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的错误倾向,大力贯彻落实毛泽东“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他明确指出,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政治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号召全党团结一致,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目标而奋斗。^[1](第4页)他针对“四人帮”的错误,勇敢地指出:毛泽东不只讲了革命、阶级斗争的政治,而且还讲了“四个现代化,还讲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三大社会基本实践”^[1](第37页)。这是邓小平公开提出纠正当时已泛滥成灾的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治国”错误的一次尝试,为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的政治大局的思想路线开了先河,并且在理论上准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的利益大局是最大的政治的新社会政治观。邓小平指出,阶级斗争的政治,在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只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⑨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由于人民拥有了自己的政权,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同旧制度基本消灭,中国社会制度的性质和社会矛盾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实行政治革命的政治观业已过时。人们应该适应形势的发展,及时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社会政治观上来。毛泽东由于在这个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没有始终如一地正确处理好从旧政治观向新政治观转变的问题,把阶级斗争理论推向绝对化,最后导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政治错误。而邓小平一复出,就及时向全党、全国人民反复阐明自己对社会主义新政治观的理解,以鲜明立场和大无畏的精神,对长达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极其错误的政治观点进行了批判和纠正,这是何等可贵!但是,很快受到“四人帮”的打击而被迫再次下台。

第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辟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这个时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两件震动全球的大事:一是中国宣布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二是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重新选择了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的发展道路。邓小平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高度,综观国际国内历史经验教训:苏东的剧变,从政治方面告诉人们,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核心,就是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即社会利益资源的配置与调控如何符合广大人民的现实要求。这是社会主义的重大政治问题。如果长期处理不当,就会扩大和加深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的国家会变质而走向自己的反面,最后被人民所唾弃。本来人民建立自己的国家,就是保护人民,服务于人民的。但是,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新生的人民政权如果不依据人民的要求及时改革其体制,建立和健全法制,公开接受人民的严格监督,人民的国家非但不能有效抵制权力的腐蚀,而且会使其弊端日益突显出来,转化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前苏联曾经出现的那种脱离实际的“命令经济”、脱离人民的“集权政治”、脱离现实的“僵化思想”、脱离群众的“官僚体制”以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权阶层”等综合病症,在“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下,因长期得不到纠正而使人民国家完全变质。^⑩邓小平则着眼于中国社会的实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出发,分析了社会政治与社会关系的本质特征,提出“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的主张,并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以1978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历史标志,中国人民开始走向了一条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从政治理论的角度看,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根本经验教训,就是没有处理

好政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概括起来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没有搞清楚。他说:“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2](第223,225页)第二,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矛盾的认识发生了严重偏差,导致了“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产生。他指出:“一九四九年取得全国政权后,解放了生产力,……但是解放了生产力以后,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件事做得不好。主要是太急,政策偏‘左’,结果不但生产力没有顺利发展,反而受到了阻碍。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左’导致一九五八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一九五九、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三年非常困难,人民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了。一九六二年开始好起来,逐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结果一九六六年开始‘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这十年,许多怪东西都出来了。要人们安于贫困落后,说什么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这就是‘四人帮’搞的那一套。哪有什么贫困的社会主义、贫困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什么是按需分配?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没有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怎么搞按需分配?马克思主义讲的共产主义是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社会。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生产力不断发展,最后才能达到共产主义。‘四人帮’荒谬的理论导致中国处于贫困、停滞的状态。”^[2](第227—228页)第三,用已经过时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等强制性的办法,解决事实上业已变化了的各種社会矛盾,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使整个社会离开了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中心,使党和国家成为了“空头政治”的工具,背离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愿。因此,他多次指出:在中国“发展才是硬道理”,“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判断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方向是否正确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第372—377页)明确地提出在中国社会主义的现阶段,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主张“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不再主要用阶级斗争的老办法来解决政治问题^[2](第195—196页)。

三

根据这些经验教训,邓小平认为,要搞清楚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政治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必须从理论上搞清,社会政治的历史走向需要经历“五大转化”,即阶级矛盾向社会矛盾的转化;阶级关系向社会关系的转化;社会阶级向社会阶层转化;政治革命向社会发展转化;阶级国家向社会国家转化。这些转化,实质上也是深刻的社会变革。

第一,社会中的政治关系由社会的主要矛盾所决定,并受其发展、变化的情况所支配。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由之而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着其基本的社会政治关系,同时,也决定着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从社会性质和社会矛盾的转变看,不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标志的,而是以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为历史转折。这一点也曾为毛泽东所肯定。他在1956年1月党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已经进入,尚未完成”。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中,他进一步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现在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向自然开战,发展经济和文化。党的八大就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做出了决议,但后来由于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路线在党内逐渐占上风而遭到否定。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重新肯定党的八大决议,确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发展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社会生产不足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于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支配着社会的各种利益,并使社会利益关系日渐社会化。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利益关系主要不再通过阶级和阶级斗争集中表现出来,而是通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种社会关系来直接表现。这是我国政治关系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所发生的深刻历史变化的核心所在。社会主要矛盾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向“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社会生产不足之间的矛盾”转化,表明我国新型政治关系中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化程度逐步占了主导地位,那种原本意义上的旧的阶级政治关系将日益被缩小到特殊范围内。以社会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社会政治生活,自然就成为了人们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以及由之所必然形成的社会政治的理论,为指导我们党总揽全局,把握新时期政治关系的特点和规律,奠定了坚实的科学方法论基础。

第二,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的最高本质主要不再是阶级关系,而是社会全局性的利益关系。邓小平在论述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权利时,总是牢牢抓住政治利益关系的本质特征,来揭示我国现实政治生活的本质内涵。比如他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归根到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如果相反,违反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违反整体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违反长远利益而追求暂时利益,结果势必两头受损失。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归根到底,就是以上所说的各种利益关系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表现。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才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局面,这就是我们今天和今后要努力实现的政治局面。”^[1](第175—176页)

当然,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们,仍然是有着不同利益的群体,分属于不同利益集团或阶级、阶层。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体利益、全局利益、长远利益等,都是以每个社会成员或各个阶层的合理和合法利益为基础而形成的。邓小平提出关于利用市场机制来合理配置资源(包括劳动资源)、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思想,实际上就是承认,我国社会成员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或是为社会主义的服务者,其劳动属于“商品劳动”范畴。^①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社会与为社会主义服务者之间,都是一种遵循市场共同原则、进行平等交换的关系。劳动者既是为私人劳动(因为劳动是谋生的手段)、又是为社会而劳动的特殊商品者。社会主义的劳动关系已经不完全同于私人资本统治下的劳动关系,但是,却没有根本改变“商品劳动”所固有的一般特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社会劳动,都具有商品的一般性质和特征:人的劳动都要通过物化为商品形式之后进行交换,人们的社会关系中自然也就物化了商品的一般关系。人的劳动一旦进入市场交换之后,就不能不必然显示出商品劳动的二重性质,即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一般价值的性质。私人劳动、社会劳动两个概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也就被合法化了。马克思早就说过,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体现了劳动是谋生手段的特点。^②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曾以前苏联为榜样,实行“计划经济”,取消“劳动市场”,长期采取“高积累,低工资”的政策,对劳动者实际上是“高额剥夺”。这就完全违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把所谓的“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变成了否定劳动者个人根据按劳分配原则获取合理合法的劳动利益。因此,邓小平在总结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时指出,搞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要正确处理好上述那些利益关系,要统筹兼顾。只有真正保护好了劳动者必要的、合理合法的利益,才能调动千百万劳动者的积极性,激活他们的创造力。人类社会发展客观上仍然需要商品、市场经济,因此必须承认社会所有劳动者的劳动,仍然具有“商品劳动”的客观性质,从而运用市场经济的客观法则,来调控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关系,除了所有制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劳动利益关系了。

现在,我们强调社会主义“商品劳动”的利益原则,正确对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合法社

会利益,自然就会承认:社会成员的个人劳动利益是造就社会主义社会整体利益的前提,是构成社会主义利益关系的第一基础;同时,社会主义“商品劳动”形成的社会利益的多样性与统一,也就成为了社会主义社会利益关系的根本特征。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利益的最高本质,就是对最广大劳动人民多样性利益关系进行正确而合理的有效调控。要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创造一套稳定的、完善的制度、机制和政策,把全体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有机结合起来,这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的根本任务。因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这些利益关系,不再被理解为纯粹的集体主义,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阶级利益和阶级关系,而是通过劳动力市场手段,灵活多样的形式,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这在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政治关系的真实含义;把全体人民的劳动利益置于政治的最高地位,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本质所在。前苏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所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主要弊端,就在于违背了当今社会客观还存在的“商品劳动”这一基本事实及其所固有的内在规律,用超越市场的行政力量直接支配和强制调控“社会劳动”,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活力,走向了脱离人民根本利益的错误道路。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利益,说到底就是要对社会主义多样性利益的协调与管理。把这一意义上的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关心好、协调好、治理好,就是社会主义政治根本内容。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的新概括,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新发展。

第三,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新变化。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层结构的根本特点,是由阶级走向阶层化。阶级作为历史的遗留,将随着非阶级性的社会主义因素的成熟和政治关系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逐步消失,各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转到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关系上来。但这必须经过一个很长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不能随意超越。邓小平的“阶级走向阶层化”理论,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阶层分析理论,它同西方现代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理论的原则区别在于,邓小平认为,中国现实社会的各阶级、阶层仍在不同程度上与多种经济成分相连,仍保留有阶级的历史遗留,必须坚持阶级分析与社会分析相结合的原则。而西方社会学则完全撇开所有制的基本条件来谈论社会分层,模糊阶级界限,否定阶级分析。

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但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的历史遗留”还会长期存在。在特殊的条件下,阶级斗争还有可能被激化,那种以为阶级斗争完全熄灭的观点是错误的。党和邓小平同志的这一估量,是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理由很明白:中国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作为历史遗留还会以各种形式长期存在;以所有制的占有为基础的阶级、阶层还会大量存在,虽然它们已经同历史上的原来意义的私人占有制、阶级、阶层的社会作用有所不同,但是,它们作为旧的私有制、旧的剥削阶级的历史遗留存在形式,是确定无疑的事实。如果不愿意承认这一点,那也是从根本上脱离了中国社会实际。因而,也就不是起码的马克思主义者。

邓小平主张,社会阶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会在社会化过程中走向阶层化,但这种阶层化又不能不带有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现代中国社会的阶层,是以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结构为基础的,即为“半阶级性”的阶层;反过来说,现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是阶层化的阶级。这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有人反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层分析,但阶级、阶层的客观现实存在,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理解邓小平的由阶级走向阶层化理论,关键在于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历史遗留及其对社会政治关系发展的影响。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励、引导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是历史的客观要求。因为,这些经济结构形式对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仍然具有积极的历史作用,没有别的形式可以代替。虽然它们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增加就业岗位、创造更多的产品、满足人民的需要,都有长期的重要的社会历史作用,对加快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强国力也有重大意义。但同时,不容否认,私有制经济形式必然会自发倾向资本主义。新时期发展起来的私营经济和它的所有者,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具有两重性。面对这个新的现实问题,如何正确估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关系,就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这里“包含着许多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复杂和困难”。正确

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阶层的特点及其变化规律,正确发挥这些社会力量和特殊阶层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是直接关系到能否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政策的一个基本问题。我们要认真吸取斯大林、毛泽东都曾犯过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布哈林所犯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等严重政治错误的经验教训,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不能随意夸大,也不任意缩小;在利用国际资本主义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问题上,既要大胆利用,充分发挥它们的历史作用,又要避免产生新的、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⑬在改革开放中,发展不同形式的私有经济,仍然需要有科学的理论和正确的政策引导,要把握好理论和政策上的合理尺度,要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始终需要注意解决好的一个问题。只要我们党依据宪法规定,鼓励制度创新,相信能够在实践中逐步解决这个历史新课题。尽管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阶级矛盾由于国际国内因素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⑭。这也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因此,不允许盲目照搬那些发达国家的“社会分层”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力量占主导的条件下,一定范围内遗留的阶级关系,再不必通过旧式的阶级斗争形式来解决,而是要通过各种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方式,促使它与社会主义力量进行多样性结合,发挥其历史进步性,化消极作用为积极作用,引导非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为社会主义发展服务。为什么可能这样做?主要有两点。一是工人阶级具有解放全人类的品质,能做到阶级性与社会性统一;二是社会主义优于一切非社会主义的因素终究会发挥出来,最后必将创造出代替其他非社会主义的新制度,使人类达到更高的理想境界。

在20世纪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国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其社会矛盾、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阶层结构、政治关系已经基本脱离了旧式的阶级关系,并逐步向着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扩展,新型的社会关系要求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式,法律的、行政的方式,来解决各种社会性矛盾和社会政治问题,而不再主要采用过去那种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方式解决问题。这种新式的政治生活方式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的政治关系已经向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社会政治关系方面转变。邓小平在1978年3月30日党的理论务虚会上,详细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政治关系、国家性质和职能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革,科学地概括了这种特殊社会政治现象所必然具有的双重性。他说: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关于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至于什么是当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的问题,由于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第181—182页)他又说:“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1](第168—169页)这个重要论述,就是他的由阶级走向阶层化的基本思想。

第四,以经济社会发展为动力,用发展经济社会的办法,解决社会政治问题。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新论断,指明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途径。过去人们常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只是就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做出了总的判断,并没有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现在提出“社会主义发展中国”,为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思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标志着中国开始由阶级的政治解放转入“经济的社会解放”的新阶段。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社会整体关系出发,重新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事业,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解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把“发展才是硬道理”作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的一条根本途径,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第 372—373 页)作为判断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标准。这样,以社会主义的发展解决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就成为了邓小平新的社会政治观的核心内容。

中国社会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其最终解决只能靠社会主义的发展。“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4](第 845 页)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并由之引出的种种政治问题,说到底,都是基于生产力发展不足而产生的。历史唯物主义把革命看做是“历史的火车头”,认为革命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是解决社会物质生产之不足,不能只靠革命手段来实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的社会主要矛盾,以及由之所必然形成的社会政治问题,只有通过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这一根本途径来解决。整个社会要以社会主义发展为主题,来建立新型的社会政治秩序。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其真谛就在这里。社会主义要消除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保证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都要靠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四个现代化是最大政治”的观点,是他的社会政治观的集中表现。

也正因如此,邓小平强调,在我国现阶段,讲社会主义的政治要力戒空谈,要使政治工作真正落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实处。他提倡党在整个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主要政治标准,就是用实际行动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积极的实际的贡献。他说:“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了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是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1](第 150 页)“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国国家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他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第 162—163 页)邓小平提出这种新的政治标准,就是告诫全党不要简单使用“站在那个阶级一边”作为衡量干部的政治标准,而是用“三个是否有利于”的新标准来衡量,这是他走向社会政治新政治观的核心思想。^[2](第 372 页)

总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我国的主要矛盾、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民最高利益的中心点,已经转化到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服务于人民方面来了。中国的政治逐步向社会化方面转型。衡量政治是非的标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发展,成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政治的本质。工人阶级代表的政治利益,转化为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利益,转化为实现劳动者经济的社会解放。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政治关系走向新型的社会政治。

第五,从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制度,通过有步骤地实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扩大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发展人民自治,推进管理科学化、社会化,实现国家社会化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政治关系社会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在现代,现代化与社会化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政治的现代化与政治关系的社会化,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国政治关系社会化主要地表现在人民民主国家公共职能的社会化方面。邓小平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的社会基础,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必将不断扩大,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政府管理职能的社会化程度会日益加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对极少数反国家和反社会的力量一定要进行法律的制裁,但是,这方面已不是我们国家的主要任务。^[1](第 168—169 页)而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为中心,不断提高政治关系社会化的水平,来促进社会团结,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首先,社会主义国家更突出、更重要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利用经济、文化、政治结构中社会主义成分的主导和支配地位,采取经济的、法律的、道德的、教育的、行政的、制度的等多种方式和手段,实行政治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有效地控制、改造各种非社会主义

的政治思想因素,制止其滋长蔓延;不再采用“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方法,而是通过说服的和发展社会的新方法,坚持持久的社会化的革新,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其次,根据现实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显示出来的新的历史特点,最大限度地吸收那些坚持爱国统一、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的进步阶层、进步人士参与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组成经济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社会大联盟,促进政治关系的社会化。邓小平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社会阶级关系日益走向阶层化、社会化^⑤,明确提出,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这种新式的、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1](第187页),这种以人民民主国家为核心的、不断扩大的社会联盟的新思想,是邓小平对中国社会阶级变动后社会关系进行科学分析而得出的新结论。他指出,人民民主国家的各种社会条件成熟,必然会促进阶级的联盟,逐步转向以社会的人民的联盟为基础,而这个社会联盟还带有阶级关系痕迹遗留,将在统一的国家、民族的范围内,在长期时间内,用发展的办法来加以解决。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设想,未来“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政治就是属于社会政治范畴。在社会生产力得到极高的发展,阶级和产生阶级的要素彻底消灭,国家消亡的条件都已具备,政治的核心从人对人的统治形态,转化为由自由人共同体对社会进行权威性管理。但是,作为强力形式的社会管理机关,即使在阶级因素完全消失的条件下,由于社会成员还不能完全达到“自由人”境界,事实上的平等还不可能完全实现,社会中还会产生各样的反对行为和反社会力量,这就还需要有“国家式的强力机关”,我们可以将这种机构称为“社会国家”。可以预测,阶级消灭、阶级性国家消亡后,还会有一个非阶级的、具有某种强制力的社会管理机关的存在。由阶级国家到社会国家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资产阶级国家转向社会国家是必然趋势。国家权力完全回归到全体社会成员手中,政治也回到社会。社会成员的基本经济、文化权利在事实上达到完全的平等,全体社会成员的政治平等权利直接通过高度社会化得以体现。那时,社会政治生活会是高度的社会化基础上的群众自治,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控机制达到了高度程序化的社会民主,社会自我管理手段将是高度科学化前提下的有效分工,社会政治形式将以完全公众化的面貌出现。人利用权力来谋求对他人统治的现象成为多余而完全消失,人们对共同约章、公共政治纪律和一致认同的道德原则,形成了习惯性的自觉行动。社会有非常发达的必然性规范,对极少数违规者所采取的“强制性”对应措施,已经完全不需要用现代国家意义上的强制力来执行,将由充分体现“自由人联合体”意志的社会性权威机关代替。这一切,标志着人类社会的更高级的新型政治文明形态诞生。所以,我们可以把社会政治的本质特征概括为:它要求将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在阶级消灭、国家消亡的条件下,回到社会之中;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经济、文化权利达到事实上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全体社会成员政治权利的平等、政治生活的高度自治和高度社会化;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控机制实行高度程序化、科学化、公众化、制度化。一句话,就是社会主义政治关系的完全社会化。在处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关系问题时,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既要实现政治关系的现代化、社会化,又要坚持实现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社会化。我们把它称为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也就是集中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目标、任务、职能的全面社会化。中国共产党人既要做坚持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现实主义者,又要做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者。^⑥要在社会主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⑦,通过“走向社会政治”的历史道路,一步一步地实现共产党人的最高政治理想。

四

“走向社会政治”理论的实质,是要从理论和政策上将“社会政治”与“走向社会政治”两者的联系与区别从学科概念上搞清楚。社会政治依成熟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条件而存在。而走向社会政治,则是为实现社会政治而准备条件,是实现新型政治的过渡形态与发展过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最初起点上,现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还远未达到社会政治所要求的必备条件。中国的现阶段还不能直接实现社会政治。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提出了走向社会政治的理论,即中国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级阶段的很长历史时期,还不能做到完全、彻底的消灭各种形式的私有制和各种阶级关系的历史遗留,还不能完全铲除滋生旧的剥削制度的土壤。这种条件下的新型社会关系,处在发育成长与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如同马克思所曾预言的那样:社会主义“不是在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在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人们之间一切“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还会不断产生一些人比另一些人富的现象。事实上的不平等还会普遍存在。^[5](第 304—305 页)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虽然能够取得政治革命的胜利,并进入社会主义初级、中级发展阶段,但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较低以及各种历史遗留,并没有随革命的胜利而在一个早晨造就出一个新社会。就像马克思曾说过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死人抓住活人”的旧东西仍然要使政治上解放了的人们长期“受苦”^[6](第 8—11 页)。

中国在革命胜利后,不仅要实行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同时要经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型。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其中包括社会阶层结构)在一切方面都将长期处于多元化的复合型的状态。社会主义的因素只能是在“自然历史过程”中逐步居主导地位。在政治关系中,阶级性的政治与社会性的政治,要长期并存。政治关系的社会化进程,要伴随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发展、成熟而逐渐成长。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建立在这个必然的自然历史过程上的,无法超越这一客观的政治历史过程,而必然要经历走向社会政治才能达到完全的社会政治的理想境地。邓小平发现和科学地解读了中国这种新的政治历史过程。

中国人民正在根据新的政治生活实践进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创新。从以阶级和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社会,逐步转型为以全体社会成员和社会公众权威为中心的社会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必经的历史过程,也是人类社会新型政治文明的一种创造。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做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不急不躁,大胆实践,改革创新,独立自主,坚决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之路。在理论上坚持走向社会政治,就是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克服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干扰。

中国面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呼唤着新的政治思维的诞生。社会政治和走向社会政治等一类政治学新概念,为我们解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政治生活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性政治关系分析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社會性政治分析法相结合,是邓小平提出走向社会政治思想的方法论基础。在阶级对立和对抗的条件下,讲政治而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在阶级逐步走向阶层化直至消灭,阶级关系在政治领域已不占主导地位,政治可以直接通过社会关系表现出来,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如果讲政治仍然坚持只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完全否定对政治的社会关系的分析,同样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

人类从 20 世纪开始,进入了使社会关系不断现代化和社会化的历史新阶段。这个历史阶段的总体特征,就是现代化和社会化的趋势与日俱增,不可阻挡,即由社会的经济、科技的现代化,走向社会生活整体性的现代化,由经济的社会化带动社会关系整体性的社会化。社会现代化与社会化不可分割地被联系在一起。推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关系社会化的动力和机制,是正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的市场化力量。在这种高度现代化和社会化的情况下,政治同社会两者的相互依存更加强烈,政治关系社会化成为历史的潮流。面对当今世界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所发生的社会化复杂进程,现代社会的政治关系社会化的问题,由于受到社会的经济、文化影响和社会制度的制约,出现了不同社会类型的政治关系社会化。因此,我们必须对之做出历史的、具体的分析。现存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都各自为了适应其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实现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关系社会化的道路。现代资本主义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阶级对立的特殊需要,其政治关系社会化是围绕国家领域(或主要通过国家领域)进行的;在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建立起来的中国,不可逆转地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进程的总目标是走向阶级后社会,这是一个新型的政治关系社会化的过程,其主要内容,是政治直接通过社会生活领域来实现。如果说在阶级社会是政治关系国家化,即在政治社会范围内进行;那么,阶级后社会则是向着逐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关系社会化过渡,即在社会政治范围内进行;前者社会化的结果,

是以强化资本对劳动的政治统治为目的,实质上是一种以阶级关系为中心的政治关系社会化进程;后者相反,是为着废除旧的阶级压迫,逐步消灭旧的剥削制度为目的,并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日益扩大以广大劳动者阶层为社会基础的新型政治关系社会化,这是以社会关系为中心的政治关系社会化进程。

20世纪世界范围内发生的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社会化,同处在一个地球上,两者既彼此对立,又相互依存,形成了一种共存、共荣局面。从现代化、社会化的内容和形式看,它们有共同的方面;但从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及其归属来看,又各有其不同特性和不同历史结局。作为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工作者,面对当今人类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目的进行着的政治关系社会化的历史进程,需要从政治理论体系和基本概念上将“政治社会”同“社会政治”两个范畴严格地区分开来;不管世界如何变化,不管国内社会形式如何变迁,坚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战略目标不可改变;中国的现代化—社会化所具有的时代特性和民族特性,决定着中国政治关系社会化的选择,也只能是社会主义政治类型的政治关系社会化。

注 释:

- ① 见《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 ② 见《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 ③ 即把“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当做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惟一内容。
- ④ 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257—260、283—284页。
- ⑤ 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256、328—333、338、348页。
- ⑥ 邓小平:《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页。
- ⑦ 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0—274、297—317页。
- ⑧ 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5—290、293—296、322—327、334—337页。
- ⑨ 历史唯物主义政治观历来认为,所谓“阶级社会”,就是指阶级对抗社会,阶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依特定社会关系而存在,同时随社会阶级的发展而发展,最后将随阶级的消灭而消失。对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而言,阶级存在是暂时的,阶级关系的政治也是暂时的。因此,阶级社会不等同于社会,社会关系不等同于阶级关系。阶级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阶级关系与社会关系,既是有差别的,又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同他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观是统一的。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割裂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
- ⑩ 参阅[苏]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别无选择——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和未来》,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 ⑪ 劳动创造了人类,发展了人类,改造了人类,不断提高和完善着人类本性。人类的劳动形态,依其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而不断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形成了“自然劳动”、“自给劳动”、“商品劳动”、“自由劳动”等由低级向高级阶段的发展。自然劳动与原始氏族制相适应;自足劳动与家庭小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相适应;商品劳动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形态两类文明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自由劳动将与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社会条件相适应。当今世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将长期处于“商品劳动”的发展阶段。
- ⑫ 这里实际上“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的同一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按劳分配“这个平等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仍然带有一种“非市场”的强制性形式的特点(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斯大林后来根据苏联实行所谓“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加上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限语。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要实行某种强制性的行政和法律措施。
- ⑬ 邓小平认为,在我国要做到避免产生新资产阶级,关键在于坚持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他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同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又说“在我们国家,搞资本主义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统一不起来。”“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补充。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倒是觉得现在外国投资

太少,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总之,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过去四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地区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3—124、138—139、364 页。

⑭ 见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四部分。

⑮ 1979 年 6 月 15 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致开幕词时,提出扩大社会主义的社会联盟的基本政策,“我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已经大大加强,我国农民已经有二十年历史的集体农民。工农联盟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各民族的不同宗教的爱国人士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到国家手中,定息已停止了三十年之久。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我国各民主党派……现在都已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治力量。”见《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85—186 页。

⑯ 现实主义者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者之区别。

⑰ 社会主义发展要经历许多阶段,如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发达阶段等,要经过几代、十几代、几十代人的不懈努力。

[参 考 文 献]

- [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A].三中全会以来[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5]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DENG Xiao-ping's Theory on *Tending towards Social Politics*: Outline

LIU De-hou

(School of Politics &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LIU De-hou (1934-), male,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Politics &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ory of political science.

Abstract: The politics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socialism is such a kind of politics that political relations tend towards socialization in socialist developing direction, while socialist soci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system are up to innov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relations in five aspects is DENG Xiao-ping's basic theory about *tending towards social politics*, which is also momentous development to Marxist political theory, and strong theoretic weapon for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politics.

Keywords: *tending towards social politics*; class orderization; political relations tending towards socialization